

陈忠实往事追忆

——纪念陈忠实逝世五周年

□王心剑

公元2016年春夏之交,陈忠实老师去世不久,陕西省人艺在人民剧院纪念演出大型话剧《白鹿原》,我受邀前去观看。

剧情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走了!”

台下观众一片唏嘘抽泣,我也瞬间潸然泪下。这一句由剧情高潮迸发而出富有张力的深沉话语,不仅触动了陕西观众对陈忠实去世的惋惜与哀恸,更是引爆了我这个白鹿原乡党发自内心的强烈共鸣,戳中了灵魂深处那些难以言说的痛楚。

我的思绪不觉回到他离世前三天的那个晚上。

大约是临睡前9点多钟,一阵手机铃声惊动了,我,拿过手机一看,来电显示是陈忠实。我大吃一惊,赶忙按下接听键,耳畔传来他口齿模糊不清的沙哑嗓音:“听说明天要举行你的长篇小说研讨会,向你祝贺!我给你的祝贺信,会让人拿到会场代为转达。”

我当时几乎全身体都僵住了。

我十分清楚陈老师此时已经病成什么样子。更没想到他心里此刻还在记挂着自己的白鹿原小乡党,记挂着小乡党这件微不足道的事。也许他担心自己的声音有断续,怕我没有听清楚,又把电话交给女儿陈黎力,让她重新复述一遍。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4月27日,我的长篇小说《生民》研讨会在西安石油大学举行。会议由省作协副主席李国平主持,省作协党组书记黄道峻代表省作协谈了对《生民》的评价意见,贾平凹主席又针对小说的得失做了长篇发言。会议还没有结束,医院就传来陈忠实老师因为大出血要进行手术的消息,贾主席和黄书记匆匆离席前去医院探望。

我送走与会的客人后来到医院,看到陈老师已经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尽管神志还很清楚,能看手机,口却不能说话。我紧紧抱住他垂在床边的胳膊,强忍住不能流出的泪水,哽咽地握住他的右手说:“您是我一辈子的恩师!”

陈老师慈爱地抬起左手摇了摇,示意我不要再说下去。我知道他如果口能言语,下一句话肯定是:“咱俩是乡党!”

在此之前,陈忠实老师每逢做过让我感动的事,当我要表达谢意的时候,他都是这个惯有的动作,一边举手示意我不要说下去,一边加重语气来上一句:“咱俩是乡党!!”

“咱俩是乡党!!!”

这句话也许只有我和他能理解其中的内涵、温度和分量!

4月29日早晨,省电视台胡小秦给我打来电话,说陈老师在个小时前走了。我放下电话的一瞬间精神就崩溃了。当我匆匆从户县校区赶到西京医院病房前,护士告诉我遗体已经送进了太平间。我急忙又来到太平间,远远看见门口停放着一辆灵车。绕过灵车迎头遇见陈老师的遗体被推出,我急忙上前跟着黄道峻书记、陈彦副部长和他儿子海力,把陈老师的遗体抬上了灵车。

目送着灵车渐渐远去,我心里暗自惊讶,为何恰巧能够在最后一刻赶到,联想到陈老师生前多次与我灵犀相通,相互间产生心灵感应的神奇往事,我明白这一定是陈老师在冥冥之中刻意拖延,他知道我肯定在路上急于赶来送他人生最后一程。

时隔数年,在陈忠实老师逝世三周年的追思会上,省作协副主席李国平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心剑啊,这让人如何承受?我记得给你的作品《生民》召开研讨会的时候,陈老师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写给《生民》研讨会的贺信,就是陈老师有关文学表达的最后绝笔、绝唱。陈老师把这最后的绝笔、绝唱,写给了你这位昔日石油大学的同事,写给了你这位白鹿原蒲桥老乡——这让你如何承受啊?”

我每每想起这段话,泪水就夺眶而出-----

陈老师人生的最后14年,一直居住和工作在西安石油大学工作室。他对自己的离世,似乎提前有预感。

2014年冬天,我从国外归来前去看望他。那时正值宁夏张贤亮去世,我走进他的工作室,他感慨之余几次提及此事,并强调说张贤亮比他大不了几岁,言下之意仿佛想点醒我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那时,我也能清楚地感觉到陈老师的身體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精神状态明显衰老,躯体有些虚弱无力。我看在眼里,却束手



无策,给他拿来国外鱼油与补充微量元素的药,他也不太爱吃,总说人变老是自然规律,再好的药也不可能让人返老还童。住他楼上的校领导对此也有观察,曾私下嘱咐我带他去青岛一个疗养院去疗养。陈老师听罢坚辞不去,他不愿意给学校领导添麻烦。我又说那咱自费去海南岛休养一个冬天,他也不同意去,我后来才意识到,此时他的身体好像已经不适应长途颠簸。

我经常劝他去医院检查检查,必要时注射一些营养药物。他有些生气地说,没有病去医院做什么!我耐心地给他解释,现代人为了养生,隔一段时间就要进医院做些理疗,属于养生之道。这就好比汽车,每隔半年就要保养,是一样的道理。陈老师接受不了这种理论,认为这纯粹是浪费资源,无病呻吟,矫情!

情况越来越不好,就在这一年年底,陈老师出现了口腔溃疡。春节前出现病状,春节过后还没有好,我心里就十分紧张。年后和朋友一起吃饭时,我忧心忡忡地对大家说起陈老师的病情,在座的交大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主任立即接口,说这要赶紧检查,口腔溃疡超过半个月不痊愈,极有可能朝着癌症转化。后来在家属的威逼下,陈老师不得已去了第四军医大学,活检结果是胰腺癌,我一下子觉得天都塌了!

陈老师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工作室,我每次走过他工作室的楼下,心里都在隐隐作痛。

在这个工作室里,我见证了他在最后14年间的文学创作,见证了陈忠实老师用勤奋的一生,为中华文学宝库留下了厚重的十卷本文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脚下这片黄土地以及黄土地上的人民深沉的爱和深厚的感情。

在这个工作室里,我亲眼见证了他在竭尽全力扶掖文学新人,为许多人的新作写题词题写书名,为年轻一代的文学创作奔走鼓呼,留下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许多作家在回忆文章里都提到过陈老师慷慨赠字题词等往事,仅通过我的手转给其他作家写的序言文章就不计其数。在陕西文坛,受到陈老师帮助、扶持、鼓励的文学青年和作家确实不能拿数字记,而是一群人。这种大爱可以升华为一种品德,一种高深的德行,这种德行足以让人尊敬、爱戴和敬仰。对于陕西的文学青年来说,他堪称是继柳青之后的又一位文学教父,一代宗师,做人楷模。

在这个工作室里,我见证了陈忠实老师高尚的人格精神。大凡一个伟大的作家,通常都具有一个伟大的情怀,他常常会把这种情怀外化为一种大爱,感染和感动着周围的每一个人。陈忠实就是拥有这种情怀和人间大爱的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的人民,热爱这一块土地。即使到了晚年,还关心着家乡建设的每一个举措:为樱桃谷代言,参加华胥陵祭祖,家乡的事无时无刻不拨动着他的神经,无时无刻不让他牵挂。白鹿原上的老百姓对他也是崇敬有加,感恩戴德。我曾经无意中一农户家,看到一个农民,为陈忠实老师写的一首既像诗歌又像是秦腔唱词的作品。他这样写:三秦咽,鹿原红旗黯,泪添潮河翻,文坛巨星,不幸殒天,回忆往昔先生生前,实为文坛陕军领袖,忠诚朴实勤奋苦练,一部巨著带富白鹿地天,原上民众怎不怀念,中华大地也在恸然,追悼先生丰功皓天,功德圆满。落款是深切怀念陈忠实先生,原上农夫敬书。

这是一个家乡农民的心声,是一个普通农民对作家的敬重和怀念。

陈忠实老师身上秉承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品质,散发着民族精神的浩然正气。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作家,他是为人民而写作,人民当然不会忘记他。

司马迁在称赞孔子的时候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在我眼里,陈忠实老师亦如是,他用一生践行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陈老师的猝然离世,留给大家的无尽的哀伤和追思。位于建国路的省作协大院内,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高悬陈老师遗像的大厅外面,飘荡着悲戚的华阴老腔。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铺天盖地,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三秦普通老百姓,人们纷纷用各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内心的悲痛。

他的葬礼,犹如地震,在凤栖原举行的追悼会上,人们更是扶老携幼,人山人海前来观瞻陈老师的遗容,哭送他最后一程。人们之所以用如此高的规格悼念这样一位人民的企业家,跟他根植于人民,为人民写作的血肉感情是分不开的。这里面除了包含大家对他文学贡献的崇拜,还有对他人格魅力的怀念,以及对他的人品与功德的敬仰。

陈忠实老师一路走好,您是一棵长存人间的常青树,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为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先知开花》是小说家杜禅继《犹大开花》和《圣人开花》后的又一部探索之作,他总是探索,不知疲倦、永不停息地探索!早年我为他的探索精神所激动,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是为他的探索精神而感动。前两部作品他邀我写序,我欣然从命;第三部作品要出版时,我已然垂垂老矣花甲之年了,他还是希望我能作篇小序。既然不做二不休,三只只能从命了。同前两部相比,《先知开花》延续了杜禅长于反讽的笔法,依然饱含以文化的虚假性为靶心的现实批判,但这一终曲的独特,却在于它将反讽的着力点导向了现实本身的虚构性,通过生活本身的戏剧性表达他对现实的态度,也表达了他对当今虚构文学的反省。

按照惯例,为小说而作的序会被置于正文之前,同时也有可能置于不止一篇序言之中。然而,《先知开花》却正是以《预言》《做梦也得有天赋》《器官假说》三篇小序开启叙述,序已然是小说的起始,它仿佛置于正文之外,实则在其内部,差异又无异于正文本身。我为小说而作的序因而是“序外之序”,“言外之意”,却又由于叙述者自序对文本内外关系的打破而不再稳妥地居于正文之外,仿佛同样会被正文吸纳,成为小说叙述的有机部分或同谋。为了这种同谋,我这里似乎只能对整个小说围绕的圆心——叙述者和主人公方程即将在自序中透露的“器官假说”——做些点到为止的陈述:它是关于我们现有的五官认知世界的限度,及要超越这个限度的奇思怪想。

正如我为这部小说而作的序很难置身于正文“之外”,方程的器官假说推想的世界“之外”也无从证实其超越的外在性,最终只能是这个被如此感知的有限世界的想象延长线,从属于世界的“正文”本身,而当小说里的器官假说被推进了佛道诸种假说的叙述漩涡之中,我这篇小序中针对《先知开花》而提出的阐释假说也陷入了叙述陷阱,或许还能暴露出真实或信念背后的叙述本质。

亨利·詹姆斯曾在《小说的艺术》中说道:“有些虚构的花朵有着真实的气味。”小说作为“虚构的花朵”当然都是“假”说,《先知开花》也首先是这样一朵散发着真实气味的“虚构”花。但从器官假说的角度来看,能闻到“虚构花朵”气味的嗅觉显然已经不是一般的嗅觉,而是我们极具拓展性的文学阅读官能,也正是小说在内的现代文化产品的大量生产,促进了我们的文学官能的允进,让我们不断重设日常五官对世界的有限感知。不仅如此,若说亨利·詹姆斯打破了小说制造的真实幻觉,《先知开花》所要戳穿的则恰恰是与之对称的一面,即真实所依赖的也无非是一种真实感、一种文学的结构,真实本身就是真实的幻觉。

还是回到小说的故事会更有意思。小说主人公方程人如其名,喜好逻辑思辨,又具有做梦的天赋,某一日受爱因斯坦的引力波的刺激,“波”出了他自以为创世纪式的器官假说,一个据说是他40年前受梦境启发而提出的科学假说,当时以情书的形式写给初恋,后来与孟勋、乌女士和陶晋三位朋友分别讲述。方程回忆起的真实在妻子夏帆眼里就是十足的幻觉,后者以普通人家出不了此等先知为由,认定方程精神失常,由此引发了接连的夫妻关系震荡。方程觉得他妻子的判断才是幻觉,于是展开了向曾经的倾听者们的求证之旅。他的每一次求证却都是一场叙述或假说间的互渗和竞夺:孟勋用他膜拜权力的“官能症”即“官僚体制本能症”来映照方程的“官能症”,本是质疑器官假说的动机和原创性,后来偏偏又基于自己的目的让方程实现其“先知”之名,以“信其有则有”的路数施法治疗他妻子的更年期爆发;乌女士用佛教的“六识”“六根”体认方程的“五官”,以为器官假说正是要穿透实相,通达如梦幻泡影的现世法外的“真”;陶晋则立足于道家的“五贼”和他对梦境的开发,坚信方程体内多出的一“贼”即一个隐藏器官正在发芽生长;最终出场的首恋对器官假说毫无兴趣,却和方程拼凑起了当年的经过,也颠覆了他对“初恋”单方面的假说。不同的叙述层叠而至,假说包抄假说,幻象编排幻象,真实的本源查不可寻。这或许是《罗生门》的另一种戏仿。

就文学主题而言,《先知开花》写的是一个平凡人和一种奇想相遭遇时的不堪承受,而这当中生活的全部脆弱性也得以展露。之所以有所奇想,是要僭越平庸生活的日复一日的重复。联系到杜禅的前两部小说,这种平庸仍需回溯到中国90年代以来的经济至上和文化坍塌。《先知开花》里也不乏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等时代背景的提升。

之所以不堪承受,则是因为不同的致信体系所发生的冲突。所谓致信体系,就是那些使我们秉信某种事实和观念的叙述结构。日常生活的法则、官场的世故、佛、道都形成了各自的致信体系,杜禅也借助方程的逻辑思辨对这些体系的不可靠及其背后的深层欲望进行了揭示、批判和戏谑。然而这种批判毋宁说是方程的器官假说投入众多叙述之流里自然传来的回音,小说真正看重的不在于对某种特定致信体系的攻讦,而在于信念撞上信念、叙述撞上叙述产生的波荡和弯曲。致信体系并非浮在表面,每一种叙述都关涉到对生活 and 世界的特殊感官,每一种叙述的后面都藏着一个主体的身份、位置和欲望,每一种叙述都可能与某种现实结合,带来实际的变异或塑造行为模式。

器官假说对方程的蛊惑,同样不仅在于其发现的重,更在于这一发现预设的“先知”那种主体身份的迷人,它立刻画出了平庸日常的出口,一跃而飘飘然。他越是进入这种假说的叙述,就越是获得现实的确认,扮演起大师来也毫不费力,而他的现实主义式的妻子则苦于这种新的主体身份与平凡生活质地的不谐。但致信体系也并非完全

封闭,它在固守自身的编码和结构时也保留缝隙和开口。因为各自固守,方程和妻子夏帆才会闹翻,从他们二人身上,我们可见人为地接受一个假说或拒绝一个假说所能到达的疯狂的极端处,而拒绝无非是缘于另有秉信。生活的保守和脆弱也由此显影,要撼动一种习惯的信念何其难也,拒斥反应的崩裂又是如此地迅速和纠结。又因为留有缝隙和开口,方程才会在几位朋友的不同信奉间拉扯,器官假说一开始更强调可感世界之限度,但在拉扯中却偏倒向了多出一个器官一重世界,由此产生超越的可能。

器官假说一开始就是修辞性地生成的。一个关键的步骤是方程读到“有个科学家这样说,引力波是‘我们在找的另一种光,一旦找到,意味着人类从此有了第六感,就像有了超能力,用一双天眼饱览宇宙中无尽的奥妙’”,引导出方程记忆深处的器官假说并为其灌注伟力的正是引力波作为“第六感”和“天眼”的意味。但这种“意味”其实并不比“就像有超能力”中的“就像”有更多意味。也就是说,“第六感”和“天眼”对引力波的刻画显然并非科学的刻画,而仅仅是过分通俗的比喻,方程与其说是受到了引力波理论和接收的启发,不如说是受到一个比喻修辞的牵引。他逮着一个比喻、一种非必然的相似性关系,用另一个“就像”回溯性地生成了器官假说这样一个镜像,一个真正的伟大理论的简陋倒影,这种沿着比喻修辞的衍生,不仅是器官假说的引发装置,而且也是文学的自我引发装置,是小说叙述得以“开花”的生产机制。

保罗·德·曼在《阅读的寓言》一书中分析了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比喻语言,他指出普鲁斯特想要追求的事物与事物之间处于某种必然性的关系因而可相互替代的隐喻实际上无法达成,“追忆”的语言繁殖仍要依靠基于偶然的临近而建立的转喻结构。在《先知开花》这部以求证和解谜的方式突显“追忆”的作品中,器官假说和小说对器官假说的叙述,同样来自那种偶然连接的转喻方式。乌女士的佛理和陶晋的道法对器官假说的收纳改编,也都基于一种模糊的“像”,并非方程所认可的“是”。在这“像”与“不像”之间,小说的叙述周转开来,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假说之镜像的差异化重复。

和第一部《犹大开花》中贯穿始终的人物祝贺类似,方程宣称自己有做梦的天赋。但他最大的天赋实则是一厢情愿的天赋——当然“一厢情愿”也可以说是“做梦”的另外一种含义。正如他苦心收藏的几百面镜子都锁进了柜子,他的摄影的专长也没有让他更能眼观六路,打破种种自设的摄影圈套,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大半部的故事无法排除是精神病患者方程的想象叙述的可能。

小说的人物亦真亦幻,乌女士原本不姓乌,“乌女士”这个代称凸显出浓厚的虚空乌有的意味,“陶晋”这个名字更是仙风道骨,而方程最终重访的初恋则始终以“燕妮”的名字示人——它不仅是对马克思的爱人这一历史人物的模仿,更是对方程当年所读的《马克思传》的文学叙述的模仿。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百年所造就的价值体系及科学思想,构成了这部小说的隐形底盘。不光如此,方程见过陶晋后总会想起他的面容,他手机录下的乌女士“证词”迟迟没有向夏帆披露,燕妮总是同学聚会的缺席者,夏帆也一直怀疑孟勋是否确有其人,两者始终没打过照面。这一系列的有意无意都使真实向幻觉境入,生活向文本塌入,小说向假说塌入。小说最终满足了解谜的愿望,让方程回到了假说的起点也即初恋燕妮那里。然而,正如两人见面前方方程做的那个“失火的梦”,火苗的“金色狐狸”吞吃了一本日记,它还将吞噬掉想象现实的堤坝,重述方程的脑中初恋的叙述。果然,重聚的两人拼凑起了一个超出各自预想的单相思故事,自己的故事仿佛别人的故事,仿佛经过了再度的虚构创作,原来当年的燕妮压根儿就没有把情书和方程对上号,遑论那层爱恋或器官假说的奇谈。真实和记忆的本源终于是一燕妮转笔刀上的镜像之源,方程收藏的几百面镜子化成了一个大的误认机器,把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孩童时期的主体幻象搬到了青春期,甚至搬到了他的整个人生。假说和误认还在继续,56岁的方程眼里的燕妮是不俗的“知识女性”,可至少从她对器官假说的冷淡和一听见方程口吐莲花便用“远了远了”拉回的态度来看,这个判断恐怕仍然是一厢情愿。讲求实证的方程颇为反讽地越证越虚。

事实上杜禅这部小说的智慧不在于方程、陶晋、乌女士等人所持的任何一种假说,不在于现实以内外世界“之外”,而是在于真假虚实之间的转换,在于深入了解人在这“之间”的间性存在。“梦幻才是生命的原动力,大地其实是弥漫天空的一种投影”或许是小说中最接近真相的假说,尽管它也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且同样仰仗于特殊致信体系的作用。从人对故事、对叙述的依赖这一点来看,我们的确从来都是“诗意的栖居”。若改装亨利·詹姆斯的譬喻,不妨说真实的花朵也都栽种在虚构的土壤里,散发着虚构的气味。最终方程意识到他提出假说谱写情书构想初恋的举动是对文学传记中的马克思的模仿,但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的模仿如何凝结着欲望、叙述和行为假说将自身缝合为一种“创见”。而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孟勋曾对方程提出的对假说原创性质疑同时适用于文学语言和叙述本身:语言和叙述从来都只能是对语言和叙述的模仿中的创造。

杜禅当然也有他的模仿和创造,《先知开花》的独特性在于它写实和先锋的双刀齐出:就小说挺进世情深处的、对诸种致信体系的揭露和谏讽而言,它坚守了现实批判的传统;而就其放大的梦幻实验动力和本源缺失情境来讲,它又回应了先锋文学的传统和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旨归。为刺出先锋的一刀,《先知开花》并未作变一般意义上的“元小说”,特别去亮明某种写作者身份和虚构叙述的行为。《先知开花》的方式是写实地展露生活的“元叙事”,通过叙述走向生活的扩散和生活向叙述的回流揭示生活的生产总是一种文学式的生产。这种生活和梦幻的相互折叠,尤其反映出造梦机器无处不在的后工业时代的生存本质。尽管小说并未着力展开后工业时代的缤纷画卷,却也标明了与社会隔离的“新世纪的自我”,或许越是这种游离和“内循环”的自我,就越是需要多层叙述的包裹,这个“自我”也无疑构成了写作的基点。

小说中的陶晋开发了一种叫“梦性”的药物,想让人在选定的夜梦中再造一个完美的现实,相当于活上两回,其实自18世纪现代小说兴起以来,人类的“生”就加速增殖,岂止三倍,而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小说就是那种使个体生命经验之外的世界得以被分享和体认的文化器官甚至“先知器官”。但也正如《先知开花》所演示的,信念或假说的开放与固执之处,亦是文学巨大的能量和限度所在。

(摘自《先知开花》,杜禅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

每个人都在自己世界里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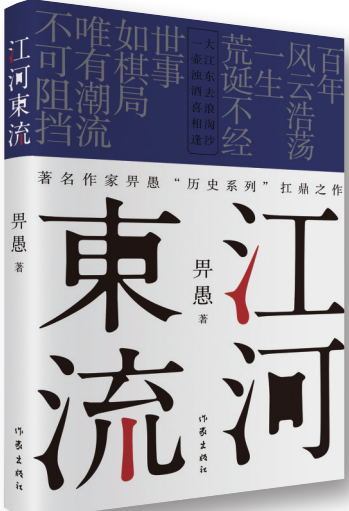
□界 愚

我一直觉得创作谈真没什么好谈的,一个小说结束,作为作者要说的话也应该是讲完了,但这个小说有点不一样,它到现在还是让我有种想要再表达一下的意愿。

事实上,这个小说于我完全是一不小心造就的,记得当时是随中国作协重走长征路,恰好风雨交加,与小凡兄在一个苗寨的亭子里看当地人烤火时,接到单位的短信,问我手头有无创作项目?可能是身处长征的氛围里,随手就回了句准备写一部《我的革命生涯》。对方向内容是什么?就又随手写了些,大概是革命在改造一个时代的同时也改造了一个人之类的,现在已经记不太清。

一个小说就这么开始着床与孕育,在他乡的风雨中,连自己都觉得那么的飘摇不定。因为,那时已经持续地写了近10年的民国时期,开始有点厌烦了,一直在考虑重拾情绪,改换步履。虽然,规划中的那一步至今尚未确定,但我至少可以说,这个小说的完成是我对民国系列写作的一个小结。

然而,整个创作过程并不令人愉快,几乎一直是处在断断续续之中,一直被琐事干扰。断开了,还得继续抱着创作中必须要有那股热情,这是件多么令人痛苦的事。一直写到过半,才忽然发现我其实在写的并不是那个我以为的年代、我以为的人物。其实,很多时候这会让我觉得好像是在创作另一个自己,是作者孤身在一个无序的



时空里梦游。也正因此,常常会发生白天的所闻所感,隔夜就会把它写进小说,而更奇怪的是,它竟然没有半点违和之感。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学与虚构的力量吧。同时,它也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更有了点辩证的意味。

或许就是这样。有时候,写作者就是这么的任性 & 无知。

这个小说写了整整两年。对于我,它更像是一座桥梁,终于让一个创作者从青年过渡到了中年。这是个反复接纳与反复领教的过程,但即便是到了此刻,我仍能体会到沉浸在那个人物中的那种感受,甚至有时一开口就会骂脏话,好像真有孙宝琨附体了一样。

不过说实话,我并不是十分喜欢这个人物,只是觉得他的无知与任性恰好是我感兴趣的无知与任性。因为,这个世界基本上就是用来磨灭我们的无知与任性的。孙宝琨就是一只井底的小蝌蚪,他不停地挣扎,与不知道是谁的人抗衡。他试图要违背整个面临的现实世界,甚至是他自己,那结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世界必然与之背道而驰。

这是一个道理,也是一种人生。

而作为创作了这个人物的作者,其实我更想探究的是他的余生。因为,他将面临一个崭新的时代,一种全新的人生。

我想,我们都该有一颗超越历史的好奇心。